



遵义历史文化十讲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遵义会议纪念馆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遵义历史文化十讲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遵义会议纪念馆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遵义历史文化十讲 /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遵义会议纪念馆 编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10

(龙文文丛)

ISBN7-5059-4675-7

I. 遵… II. 遵… III. 文学-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1632 号

书 名	遵义历史文化十讲
作 者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遵义会议纪念馆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庄 文
封面设计	常 言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6.5 印张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4675-7/I · 3658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74.4.26346

遵义历史文化十讲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七十周年!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会议纪念馆

K203
304

前言

● 曾祥铤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田兴詠和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雷光仁两位同志交谈后,提出了一个动议:研究会为纪念馆的解说员及其他同志讲讲遵义会议与长征,讲讲遵义的历史,近可帮助进一步改善人员素质,提高服务质量,远可促进新的研究人才的成长。于是有了每周一次的遵义历史文化系列讲座,共十讲。从2005年5月17日到7月20日,持续两个多月。研究会业务主管部门市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的陈开志局长得知此事后,通知该局的部分同志也来听讲,三位局长、副局长也完整地听完了一个讲题。纪念馆的有关领导,自然经历了讲座的全过程。

讲座结束后,有同志建议将讲稿汇集成册,以便参阅,就有了这本《遵义历史文化十讲》。有的同志是用提纲讲述的,成集前,按提纲补写了相关的内容。此集属于汇编性质,未进行统稿,故讲稿详略不一,长短不等,风格各异。基于此次讲座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解说员,内容的总体安排上,一半与他们的现有业务直接相关:有五讲讨论遵义会议与红军在黔北的活动。既名为“遵义历史文化系列”,也勾划了遵义历史的大体轮廓,对每个大的历史阶段进行了粗略的介绍,但远远不是“遵义史”。之所以“粗略”,一是讲座

的时间有限，一是“遵义历史文化”这部大书，有的章节我们还没有打开或者打开了却还没有进行认真、仔细的阅读。

遵义的历史文化是值得认真、仔细地阅读的，理由很多，这里不展开讨论，只举几个实例供大家探讨。走出遵义会议会址，常听到外地游客这样的询问：遵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除了长征、除了遵义会议，还有哪些历史遗迹？不少本地人往往也说，觉得感受不到更多历史文化的存在。此时此刻，不必去历数遵义有多少国保、省保、市保、县保的文物单位，其实，历史就在身边，就在脚下。

例如，会址所在的子尹路，其命名与路另一侧十一中校内依然保存完好的郑莫祠，都已有70年左右的历史。郑莫祠为纪念清代中期的“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而立，路就是以郑珍的字“子尹”来命名的。郑、莫及清代后期的黎庶昌是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路与祠不但显现着20世纪30年代遵义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且还让人联想到“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的山青水秀的小村落沙滩（见张其昀主编《遵义新志》），景仰那重视教育、文化勃兴、人才代出的繁荣的文化景象。

又如，子尹路南端，离会址最近的公共汽车站的站名叫“协台坝”，“坝”虽已修满校舍、商场、民宅，其名称却仍承载着相应的历史。协台是副将的别称，是清代康熙九年（1670年）以后遵义府最高军事长官，协台坝即为其官署所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之际，遵义知府袁玉锡主持修建遵义中学堂，嫌考棚处（现遵义军分区所在）太窄，建议与协台官署互换地址，现遵义市十一中及其周围大片地方即成为当时遵义最高学府之所在。遵义中学的建设，还有不少与袁玉锡相关的故事。

再如，与子尹路相接的洗马路的北端，名为高桥，就因该处的那座小巧的普济桥得名。位于竹鼯溪流入湘江处的这座卷洞石桥，建于宋代，为播州杨氏13世杨粲时所造，是播州城往北的主要通道。它

比当时湘江河上所有的桥梁都高，故俗称“高桥”。而今周围高楼林立，湘江河上的大桥一座比一座壮丽，更映衬出已近800岁的“高桥”的历史光辉。

再看看更近的历史。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许多纪念活动，常常让我们联想起作为后方重镇的遵义当年全力投入抗战的峥嵘岁月。如《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就将经历过抗战时期的人们带回到那战歌入云的时代。歌咏活动一直是抗战时期抗日救亡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共遵义地方组织领导的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歌咏队、民众话剧社、音乐教育促进会等，一直以歌咏活动为其主要宣传方式。1941年他们就在老城小学（现文化小学）大礼堂组织演出过完整的《黄河大合唱》，且反映非常热烈。组织者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和音乐家潘名挥先生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对排练、演出情况都有明确的记载，前者的文章是《解放前遵义的歌咏活动》，后者的文章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均收入原遵义市文化局史志编写组1990年7月编出的《遵义文化史专题史料汇编》中。20世纪50年代初，遵义师范学校合唱团也排练演出过完整的《黄河大合唱》，组织排练和指挥演唱者是音乐教育家杨起才先生。陈福桐与杨起才二先生至今仍然健在。可惜，一些同志并不了解，还误以为抗战胜利60年后遵义才“首唱”完整的《黄河大合唱》。

由于种种原因，远的、近的，许多珍贵的历史，仅仅为少数专业工作者或爱好者所知道，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未能成为广大群众现实的精神、物质财富。有鉴于此，不能不说兴詠与光仁二位同志的策划确为高瞻远瞩之举。因为如此，开设讲座的同志们虽然都很忙，仍乐意接受了讲课的邀请。

讲座的开设与汇集的编出，都是由遵义会议纪念馆与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进行的。受两方的委托，写下以上个人的一些感触。

2005年9月3日

目 录

/ 前 言	曾祥铎 1
曾祥铎 / 第一讲：有容乃大的遵义历史文化	1
谢尊修 / 第二讲：从远古到唐末的遵义	12
葛镇亚 / 第三讲：从唐朝到明末的播州	22
曾祥铎 / 第四讲：改土归流到民国年间的遵义	44
侯保重 / 第五讲：遵义会议召开前的历史背景	70
费侃如 / 第六讲：遵义会议	98
关黔新 / 第七讲：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	112
黄先荣 / 第八讲：演绎“红军在黔北”	135
田兴詠 / 第九讲：红军长征在遵史迹	167
游平伟 / 第十讲：遵义革命斗争史	175

· 曾祥铎 · 第一讲

有容乃大的遵义历史文化

遵义成为1982年2月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遵义会议在此召开是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同时还因为它拥有其它丰富多采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仍需进一步发掘、搜集、研究、保护、宣传和利用，其它历史文化资源，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僻处西南山区的遵义，历史文化积淀较为丰富，其重要原因，是它早已形成“有容乃大”这一传统，或曰特征。

拟从遵义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及有容乃大的历史佐证两个方面予以讨论。

一、遵义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

抗日战争期间，在杭州的浙江大学被迫西迁，1940年1月至1946年6月，在遵义、湄潭办学6年半。这一时期，物质条件虽然较差，学校却不断发展壮大，由一所地方大学成为国立大学，在“求是”学风指引下，爱国热情高涨，教学质量优异，科研成果累累，被誉为“东方剑桥”。该校史地研究所张其昀教授主编的《遵义新志》就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张其昀教授执笔的“历史地理”一章，将现遵义市中心区域（含现红花岗区、汇川区、遵义县）抗日战争以前的历史，划分为以下9个阶段：

1、夜郎期：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前。“遵义古属夜郎”，“古时川境泸叙江南一带，黔北乌江及赤水流域，以迄滇东北盘江上源，统称夜郎，其中心当在今黔西安顺附近。”“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夜郎侯入朝长安，武帝封为夜郎王，此为黔省汉化之始。”

2、牂牁期：汉武帝元鼎六年至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前111～公元635年）。“自夜郎隶归版图，建为牂牁郡（以牂牁江得名，即今之北盘江）”，“然自两汉以迄隋唐，其地虽设郡县，太抵以夷治夷，因其故俗，羁縻勿绝。虽汉人有仕宦经商而留居斯土者，惟为数盖鲜，渺无可稽。”

3、播州期：唐太宗贞观九年至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635～876年）。“唐之播州始建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初名郎州，十三年改名播州。”“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与刘禹锡俱出为刺史，一得柳州，一得播州”，柳为照顾刘，请求以柳易播，“足证唐时贵州高原之荒昧闭塞，犹远逊岭南山地也。”

4、杨保前期（白锦堡期）：唐僖宗乾符三年至南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876～1176年）。“杨保为保保之一族，始居于川黔边境之赤水河流域，北与叙（宜宾）、泸（泸县）为邻。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杨端自西北入居播州，奠首邑于白锦堡”（或曰今南白镇，或曰杨粲墓处，或曰南宫山附近之挨河村，或曰其它地方，尚无定论）。

5、杨保中期（穆家川期）：南宋孝宗淳熙三年至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176～1573年）。“杨轸自白锦堡徙治于穆家川，即为今遵义山城所在地（穆家川至明始称湘江）。此期与前期不同之处，在土酋多渐濡汉化，民俗为之一变。并以设科取士请于朝，许其每岁贡士三人于杭州。”

6、杨保后期（海龙囤期）：明神宗万历元年至二十八年（公元1573～1600年）。“万历元年（1573年）杨应龙袭封，知川兵脆弱，

阴有窃蜀之志，二十五年七月起兵反”，“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神宗命李化龙为总督，以重庆、贵阳及湘西沅州三处为据点，动员二十四万人，八路进攻，始得克服其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土归流，以播地设遵义、平越二府”。

7、老城期：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至清代中叶乾隆年间。“播乱既平，筑府城于穆家川，位于湘江西岸，是为老城之起源。”“雍正五年（1727年）以前，乌江为黔蜀二省省界，遵义府原隶四川，故今民俗颇类川风”。“清代贵州十二府，富郡有二，曰黎平、曰遵义，黎平以木，遵义以茧。”

8、沙滩期：清代中叶。“沙滩黎氏为遵郡望族，先世自四川广安县迁来，自清乾隆以后，世有贤才”，“郑莫黎三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故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之文化区。”“沙滩文化”之说，即源于此，代表人物为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

9、新城期：清咸丰八年（1858年）开始。“太平天国以前，因黔北交通贸易之进步，遵义市区范围已扩充至湘江东岸，市肆荣盛，称为新街。及太平天国败军西犯时，新街之规模已相当可观，故不能不建筑城垣，以资防护。新城于咸丰八年（1858年）落成，与内城屹然对峙，成双联市之型式。民国十八年（1929年）筑渝公路贯穿新城，为新时代之开始”。

“沙滩期”无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其起迄的标志，也无明确的起迄日期，但却把“沙滩文化”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突显出来，这对遵义历史文化的研讨，对今后地域文化的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它几个时期的划分，对于探讨遵义的历史极富启迪性。

就治理形式划分，现遵义市地域可分为以下8个大的阶段：

1、原始期：旧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黔北这片土地，据考古发现，古人类就已在此栖息：桐梓九坝镇岩灰洞中留下遗迹的“桐梓

人”，生活于大约 20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桐梓城南马鞍山文化遗址、汇川区内的风帽山文化遗址，则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习水土城镇境内发现的磨制石斧、石网坠及仁怀怀阳洞发现之石斧等，则为新石器时代使用的工具。

2、部族期：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 770～前 221 年）。这一时期，此地域为中原化外之地。春秋时，分属诸小国：现红花岗区、汇川区及遵义、绥阳、桐梓、湄潭、凤冈等县地域，为鳖国境；现习水县及其周围，为鰲国境；现赤水、仁怀两市一带为蜀国东南境，后为夔国；现正安、道真及务川三县之一部分，为巴国南境；现余庆县乌江以南部分，属占了当今贵州大半地域的牂牁国北境（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并无牂牁国存在）。战国时期，上述地域为日益强大起来的夜郎国所征服，成为大夜郎国（实为部族联盟）的一部分。

3、郡县期：秦至唐中期，即秦始皇二十六年至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前 221～公元 771 年）。秦统一全国后，推行战国时已局部实行的郡、县制，夜郎地区也纳入了统一建置的范围，今黔北地域基本上成为巴郡南部。秦二世时，天下大乱，此地域又恢复到战国时状态，直到汉初。汉代承袭秦代郡县制，今黔北地域分属巴郡、犍为郡、牂牁郡。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的 370 年间（公元 220～589 年），此域归属，变化频繁。隋文帝时改郡为州，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此域分属牂牁郡、泸川郡、明阳郡、黔安郡。唐代的州分为经制州与羁縻州，经制州由吏部委任刺史治理，羁縻州由都督府指定土著首领代管。除余庆、仁怀部分边缘地带外，其余分属播州、黔州、费州、夷州、溱州、南州、牂牁州等经制州。

4、土官期 唐代宗大历六年至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公元 771～1600 年）。唐代宗大历六年（771 年），罗荣率师入播州平乱，受封世袭其地，传至五世，为南诏所逐。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 876 年），杨端入播平南诏，遂世有其地，并不断向四周拓展。唐、宋时为羁

縻，元、明时为土司。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战争剿平杨氏29世杨应龙的反叛，结束了土官统治。

5、四川遵义府期：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至清雍正五年（公元1601~1727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即平播战争次年，播州改土归流，分设遵义、平越二军民府。（康熙二十六年，即1687年，去掉“军民”二字）。遵义军民府属四川省，辖四县一州：遵义县、桐梓县、绥阳县、仁怀县（含今仁怀、赤水二市及习水县）及真安州（含今正安、道真两县）。湄潭、余庆两县，时属贵州平越府，凤冈县（时称龙泉县）属贵州石阡府。现务川已于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改土归流，属贵州思南府。

6、贵州遵义府期：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728~1911年）。雍正五年决定将遵义府及其所辖四县一州改属贵州省，而将贵州之永宁县（现叙永），由贵州划给四川。“黔北”之称由此开始。

7、民国期：民国元年（1912年）至三十八年（公元1912~1949年）。

8、共和国期：1949年至今。

二、有容乃大的历史佐证

“有容乃大”这一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 1、不自卑，能拓展；
- 2、不自闭，好寻求；
- 3、不排外，善接纳。

遵义历史文化，因此而积淀丰厚。试举部分例证以说明这一点：

1、关于“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典出司马迁《史记》，认真审读原文，文中并无嘲笑夜郎自不量力、妄自尊大之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之主，

不知汉广大”。唐蒙受汉武帝派遣，“从巴、蜀笮关人，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治吏，使其子为令。”就上述记载可看出，第一，与周围各国相比较，“夜郎最大”；第二，因道路不通不了解汉朝情况，问“汉孰与我大”，此乃人之常情；第三，发此问者还有滇王，并非只是夜郎侯一人；第四，知情后，夜郎并未划地为牢、固步自封，同意纳入了汉之版图。既然如此，有何值得讥笑的呢？原文无此意，引伸出此意过于牵强；滇王发问在前，又为什么不说“滇国自大”呢？夜郎侯的言行，所显现出的正是既不自卑，也不自闭、不排外的豁达之风。

2、汉三贤。“汉三贤”之说，源于莫与俦创立的汉三贤祠及郑子尹的《汉三贤祠记》。道光三年至二十一年（1823~1841年）任遵义府学教授的莫与俦，于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在学宫内设祠祭祀汉代舍人、盛览、尹珍等三位黔北以至贵州的文化先驱，并嘱郑子尹写了《汉三贤祠记》。舍人，汉武帝时犍为郡人，曾任犍为郡文学卒史，著有《尔雅注》三卷，“注古所未训之经，其贯通百家，学究天人”，“南中若莫先师，断推文学鼻祖。”（《遵义府志·列传一》，下同）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受派到成都通西南夷时，盛览前去向他请教作辞赋的方法，获教后写出了《合组歌》、《列锦赋》等作品，后“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尹珍，字道真，东汉时毋敛人，官至荆州刺史。因本地没有学校，文化十分落后，他不畏艰险，远涉数千里，到中原向许慎、应奉等名家学习经学、文字学，“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现正安毋敛坝上的务本堂，相传为他故宅及讲学之处，绥阳在明代亦发现过“汉尹珍讲堂”碑，1941年正安北部新建一县，即以他的字命名为道真县，以示纪念。舍人、盛览、尹珍在汉代就树立了向外寻求，善于吸纳、敢于开拓的典范。

3、李白长流夜郎。李白是否已到达流放地夜郎的千古之争，或

许还会继续下去，但李白长流夜郎这一史实以及他与此相关的大量诗歌，已成为黔北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黔北的文学、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却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如明万历年间的《遵义军民府志》、清道光年间的《遵义府志》、民国的《续遵义府志》、民国及近年的两种《桐梓县志》，都选录了部分李白的诗作（有的待考），民国《桐梓县志》人物传部分把李白列为“流寓”之首。又如，据明清以来的部分志书记载，李白长流夜郎的遗址遗迹，以桐梓夜郎坝（当时夜郎县所在）为中心，广及贵州、重庆、湖北、湖南、广西相邻五省（区、市）的11个县（区）。方志有载，大地有迹，这是深远影响的有形昭示；还有无形但却实际存在的启迪与推动。如明代状元杨慎，被贬谪云南永昌卫（现保山）而途经桐梓县，所吟《夜郎曲》五首之一曰：“夜郎城桐梓，原来堞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对700多年前到过此地的翰林李白，山野村民都津津乐道，更不用说学子、文人了，可见影响之深远。清康熙年间四川学道王奕清视学途经桐梓，嘱县令金廷石修葺太白碑亭，并写下了《重修太白亭记》，记中说：“今适以播州行过此，得以拂拭公之后尘，而想企公之流风，觉去今千百年，犹爽然见公于残碑断句间。”以上种种，足以说明黔北之乐于吸纳，善于吸纳。

4、唐代佛教的传入。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形态，与之相融的还有建筑、雕刻、文学、音乐、绘画等等，而且是与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黔北是贵州最早接纳佛教的地区。当时，桐梓有金锭寺、玄风寺、兴旺寺、三座寺（由长寿寺、青都观、瓦庙子组成），仁怀有景福寺、永安寺，正安有大成寺、蟠溪寺，遵义有大悲阁。先贬播州后改迁连州的名诗人刘禹锡有《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义舟在中原与刘禹锡谈诗论道之后，返回“黔南”弘扬佛法，刘禹锡写诗并引为其送行。“黔南”指黔中郡之南，郡治在现重庆之彭水县，现贵州地域皆在其南面，概称“黔南”，佛教当时仅传

入现黔北一带，此文中之“黔南”实指现在之黔北。由此文可知唐代中期已有高僧在黔北活动。从唐代起至以后的列朝列代，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文化，已成为黔北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值得一提的是，遵义大悲阁，为当时侵入播州的南诏所建，南诏被赶走以后，大悲阁依然作为一种文化被保存下来。乐于接纳的胸怀、气度与善于吸纳的能力、手段于此可见。

5、罗荣、杨端的先后入播。罗荣入播，世袭5代近百年；杨端入播，世袭29代725年。无论按其家传所说，是来自山西太原的汉族，还是按照谭其骧教授等学者的考证，是来自川南泸州、叙永一带的杨保族，都是大规模的移民，特别是第二次，与杨端一起入播的还有七大姓。移民至此，秦汉时就已开始，此后明代的改土归流、明清鼎革时期，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移民与原住民的融和，不仅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是形成“不排外”这一良好态势最基本的原因。

6、“播州盛世”的出现。播州杨氏13世杨粲袭位期间，号称“播州盛世”。实际上，11至17世，即南宋至元代初年，皆为播州杨氏向上、繁盛的阶段：11世杨选袭职，正值宋高宗南渡，南宋开始。他不仅“务农练兵，以待征调”，而且“性嗜读书”，择名师教“子”“经”，“闻四方士有贤者，厚币罗致之，岁以十百计”；12世杨轸之弟杨轼“留意艺文，蜀士来依者愈众，结庐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13世杨粲，平患拓地，政治宽简，“复大修先庙，建学养士，作《家训》十条”；14世杨价“好学、善属文”，且“诵于朝，岁贡士三人”；15世杨文，多次抗击蒙军告捷，也“留心文治，建孔子庙以励国民，民从其化”；16世杨邦宪，“倜傥，有大节，好书史，善骑射”；17世杨汉英8次进京晋见元帝，他“急教化，大治泮宫，南北士来归者众，皆量才用之。”二冉八进士等杰出人才，就出现在这一阶段。播州杨氏此7代的作为与这一时期经济、

社会的发展，也充分显现着吸纳、拓展之品格。

7、平播与改土归流。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战争与次年的改土归流，两者皆是遵义地域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事件，加速了本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上表现出更为开放的姿态，文化积淀更为多样、快速。平播将领中，不乏颇有文才者，如平播总督李化龙、协助总督的贵州巡抚郭子章、平播监军杨寅秋，1934年上海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皆列有他们的条目，督饷的重庆知府傅光宅、綦江路平播总兵官刘珽等也都能以诗咏志。战争结束，他们随军离去，而与平播、与黔北有关的作品却留了下来。改土归流后大批进入本域的府、州、县官员，由四川、贵州、湖广进入的大量移民，也都带来新的文化因素。

8、明末清初的多元文化汇聚。明朝末年，四川除遵义府外，其余地区皆被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所占领；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军也未能迅即攻占西南广大地域，顺治十七年（1660年）以前，为南明永历政权所控制。因此，黔北地域成为避难移民与明末遗民藏身之地，成为“萃集禹域文化精英”的“畿辅”之区（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形成多元文化汇聚于此的格局。人是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本土居民，包括历代移民的后裔；二是移民；三是流官；四是遗民；五是入境高僧。多种文化汇聚、交融，使黔北地域文化基本成型。如此成型的过程即呈现着完全的开放性与极大的包容性。

9、沙滩文化。前已提及，“沙滩文化”的提出，源于《遵义新志》关于“沙滩期”的划分与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推重。“沙滩文化”，指清代乾隆及其以后的百多年中，在方园不到十里的村落沙滩，以黎氏为主，郑、莫、黎三家重视教育，倡导文化，人才代出，著述宏富，成为清代中、后期全国知名文化区的文化景象。其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与杰出学者、著名外交家黎